

从“存储”到“对话”： AI 时代高职课堂抬头率困境的弗莱雷式反思

张丹¹ 王一²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福建泉州 362200)

[摘要] 高职课堂抬头率低是一线教师普遍面临的现实困扰,然而,这一现象往往被归因为学生态度不端正、手机干扰过大或教学方式单一等。这些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体责任。事实上,当课堂把学生定位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低头就成了必然产物。如今, AI 时代到来,知识变得人人随时可得,存储式教育更失去了原本的功能,这一问题也被明显暴露出来。本文借助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存储式教育及对话式教育理论,揭示困境的深层问题,同时指出弗莱雷理论在 AI 时代高职语境下的适用范围及重构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价值重构、角色重构和评价重构的路径,有策略增加课堂的对话与问题导向,以期为 AI 时代高职课堂改革提供可行性参考。

[关键词] AI 时代; 保罗·弗莱雷; 对话式教学; 高职课程; 存储式教育

From Banking to Dialogue : A Freirean Reflection on the Challeng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lassrooms in the AI Era ZHANG Dan¹, WANG Yi²

(Quanzhou Light Industry Vocational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200, China)

[Abstract] Low head-lifting rat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lassrooms are a common practical challenge faced by frontline teachers.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is often attributed to students' poor attitudes, excessive distractions from mobile phones, or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se explanations have some validity, they transform a structural problem int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ies. In fact, when the classroom positions students as passive recipients of knowledge, lowering their heads becomes an inevitable outcome. Nowaday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I era, where knowledge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t any time, banking education has largely lost its original function, and this issu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xposed.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of banking education and dialogic education proposed by the Brazilian educator Paulo Freir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eeper structural problems underlying this dilemma. It also identifi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reconstruction goals of Freire's theor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roles, and assessment, along with strategic measures to enhance dialogue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in the classroom, aiming to provide a feasible reference for classroom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Keywords] AI Era; Paulo Freire; Dialogic Teaching;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Banking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AI 技术的普及正在改变学生知识获取的方式,对于“数字原住民”的高职学生而言,基础理论知识与标准

作者简介

张丹,女,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王一,女,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答案可通过 AI 随时获取,传统课堂作为知识传递中心的角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高职课堂的低头化和手机依赖已成为普遍现象,部分院校甚至将抬头率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核心指标之一。梳理现有研究,对抬头率的问题归因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学生论,认为高职学生基础差、没有形成好的学习习惯、自控力较差,把问题归因为学生自身的问题。第二种为技术论,认为智能手机、无线网络是最大的问题,游戏、短视频这些能给学生带来高频刺激的内容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第三种是方法论,认为教师教学方法单一,课堂都是教师一味输出,缺乏互动,同时,讲授内容与社会发展或职业场景存在脱节。这些解释当然有其经验依据,也是抬头率低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一个共同的认定,就是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学生自然会抬头听课。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案自然就被锁定在管住学生、管住手机、改造方法这几个方向,因此,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有:降低授课难度、课前手机袋收缴手机、增加课程中视频素材、设计互动环节等。然而,这些方法奏效甚微,学生处在身体被强制归位,但思维仍然游离,课堂看上去秩序得以维持,但并未提升教育的效果。事实上,这种被动接受的模式过去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知识被教师垄断,学生不听课,很多知识就不能掌握,但 AI 时代改变了这一垄断,学生可以通过 AI 获取想要的知识。这一困境普遍性与顽固性引发我们思考:问题可能在深层的结构性层面。

二、弗莱雷的理论支撑

要破解上述的困境,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本文以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存储式教育与对话式教育理论为支撑,并非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套用的万能办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帮我们看清问题背后的根源。

(一)弗莱雷教育思想与高职教育的契合

弗莱雷在《被压迫教育学》中,将教育定义为一种解放的实践,他的核心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平等的对话过程。在弗莱雷看来,传统教育的根本问题把教等同于讲,把学等同于听,学生处在被动的地位,丧失了参与知识建构的机会。

其次,学生不是等待填充的“容器”,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认知主体。他提出“银行存储式教育”这一概念,将教育过程比作银行存储行为,即教师是存款的人,学生是账户,知识是待存入的货币^①。在这一模式中,教师居于绝对权威地位,他们的任务是单方面向学生账户中存入更多的知识,学生的任务就是被动接收、掌握这些知识,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质疑提问与自主表达的空间,割裂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忽视教育唤醒个体意识,压抑学习者的批判意识与创新思维。

最后,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听话的人,而是唤醒人的批判意识。弗莱雷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形成独立判断能力,而不是把人驯化成接受现实的工具。

这一观点与高职教育的需求存在共通性,高职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高素养技术技能人才,而 AI 时代,这一目标的实现越来越依赖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信息甄别能力等,这些能力很难通过老师讲,学生存储的方式获得,而要在对话、提问反思的过程中养成。

(二)存储式教育与对话教育

1. 存储式教育

存储式教育不单纯是某个教师的个人选择,而是一套相对稳定的运行逻辑。

首先,师生关系被预设为固定的结构,教师是知识的输出者,学生是接受者,这种等级化定位不仅体现在日常课堂交往中,更渗透在课程设置、学生考试形式与评价体系中等各个环节,成为一种默认的教育前提。其次,知识被当作可脱离具体情境而独立存在的物品,教师把知识拆解为可量化的知识点,考试的核心是考查这些知识点有没有被学生存储在大脑中,这一过程中,学习被理解为记忆,学生失去了质疑能力。第三,学生的客体化定位。在存储式教育中,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他们不需要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提出问题,只需适应被指定的教学内容和被动回答教师给出的问题。最后,沉默文化的制度化。弗莱雷发现,在存储式教育的结构中,学生会逐渐形成一种沉默文化。学生不提问、不质疑、更不会主动参与课堂互动,甚至被动的回答问题都被看成是互动。弗莱雷批判这种模式的核心不是因为效率低下,而是它压制学生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

2. 对话式教育

针对存储式教育的弊端,弗莱雷提出了对话式教育。即师生以平等尊重为基础,围绕生成性主题共同反思、

双向交流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教师不再独自掌控知识输出,知识也不是被当作可以存储的静止物,而是围绕生活现实,在对话中生成、不断重构和丰富的问题。因此,对话式教育不再是教师问,学生回答,而是师生共同问的教学模式转变,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更应成为问题的提出者^[9]。在弗莱雷看来,对话式教育核心不在于如何让学生记住正确答案,而是唤醒学生批判意识,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大胆提出疑问,在互动与提问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终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三)AI 时代高职课堂与弗莱雷理论的适用与局限

高职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面向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素养技术技能人才,强调实践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育,这与弗莱雷对话式教育中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实践探究的核心主张一致。与此同时,高职学生多存在被标签化被动学习的群体,长期处于存储式教育的压抑之下,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较弱。而 AI 时代的技术变革恰好为打破这种压抑状态提供了可能,AI 工具可承担知识存储,标准答案供给等基础性任务,使课堂释放更多空间用于对话、探究与解决问题,这与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套理论在高职课堂落地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能力的差距。对话式教育要求教师具备问题引导和设计能力,也要求学生有基本的表达意愿。但高职学生长期习惯被动听课,突然让他们提问可能会冷场,这并非学生不行,而是缺乏信心和训练。其次,现在有评价体系会挤压对话空间,教师即便认同对话式教育理念,也很难拿出时间让学生尽情提问,这并非教师不想改,而是制度压着不敢改。最后,AI 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探究工具,也可能成为学生回避思考的拐杖,如何让 AI 服务于对话而非代替思考,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难题。

正是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将弗莱雷理论教条化、理想化。因此,本研究不是全盘接受他的理论,而是将其作为诊断工具,转型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实现教科书式的纯粹对话课堂,而是在现实约束下,有限度、有策略的增加课堂对话意识和问题导向。

三、抬头率的困境

抬头率困境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学生低头的行为,而是围绕这一行为形成的悖论,教师管控手段严厉,抬头率可能在短期内上升,但教师耗费在行为管理上的精力越多,用于教学优化的精力就会减少,学生越是被强制抬头,他们的抵抗也越普遍,师生关系反而更对立,课堂教育功能被减弱。所以,低头不在于行为的本身,而在于课堂无法提供值得抬头的内容,管控手段试图以外部强制弥补内在吸引力的缺失,注定收效甚微。

从表层看,这一困境的成因是清晰的。一方面,AI 工具消解了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的不可替代性,当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获取课堂所讲授的知识,甚至获取更多个性化和自己真正需要的内容时,教师便不再是所谓的“专家”。另一方面,部分高职课堂仍采用知识讲授模式,未能与职业场景、AI 应用进行有效结合,导致学生产生课堂学习无用的认识,这是一种需求的错位,而非简单的低头,学生不是不想学,而是觉得课堂给的不值得花时间去听。因此,从表面看,这是一种供需的错位,但如果再追问下去,既然学生觉得课堂的讲授的内容不值得听?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是他们值得听的?前面已经分析过,存储式教育把学生定位为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任务是听、记、背而不是问、质疑、探究。这套逻辑在过去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知识被教师垄断,学生不听课,就无法获取相应的知识,但 AI 打破这一垄断后,学生也有了获取知识的渠道。于是,一个原本被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课堂还在用存储式的方式运转,但学生已经有了不配合的资本,当他们发现课堂无法提供超过他们需要的价值时,低头就成了必然选择。

在弗莱雷的分析框架下,这种低头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沉默抵抗,它不是对学习的拒绝,而是拒绝一种无意义的学习方式。这并非是对低头行为的辩护,而是看到这其中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日常的管控策略实则反映了这种忽视,因此,任何不触及这一层面的改革或手段,都只能收效甚微。

四、范式重构

(一)重构目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引出另一个追问,如果知识存储与传递不再是课堂的核心功能,那课堂应该做什么?本文认为,以下四种能力是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

1.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在 AI 能瞬间给出答案的时代,提出好问题正在成为一项核心能力。所谓好问题,不是寻求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指向未知、打开新的思考方向。过去的传统教育更看重回答问题的能力,而未来教育更关注提出问题的能力。AI 可以回答问题,但一个问题是否值得提出,以及如何提问才能获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仍然需要人来做出判断。

2.判断信息质量的能力。目前,AI 生成的内容并不一定正确,甚至经常出现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因此,学生需要具备判断 AI 所提供信息是否可靠、逻辑是否自洽、有无偏见等能力。这并非传统的批判性思维,而是面向 AI 时代的信息评估能力,这需要我们不能轻易信任任何单一信息来源,无论是教师,还是 AI。

3.与 AI 协作的能力。AI 不是简单的工具,更像是合作伙伴。学生需要学会的不仅仅是如何使用某个软件,而是如何与它进行有效对话,如何将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并通过多轮追问逐渐接近理想答案。这是一种新的能力形态,即人负责方向、判断和创造,AI 负责信息处理和执行。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工协作的关系。

4.不确定中做判断的能力。AI 给出的通常是概率和可能性,不是确定的真理,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学生面对的大多是模糊、不确定的情况,他们需要学会在没有标准答案中,基于有限信息作出判断,并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这种能力无法通过死记硬背获得,只能在持续的对话与反思中慢慢养成。

这四种能力都无法通过存储式教育获得,必须在对话、探究和思考中养成,这正是课堂转型的根本方向。

(二)价值重构:从知识积累到能力养成

课堂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教师传递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学生是否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在对话反思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因此,问题只是起点,探究和对话才是核心。当教师不再把讲完知识作为第一要务,而是把激发认知冲突、引导学生探究作为核心目标时,课堂的功能定位才能发生转变。这一转变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知识传递的功能可以部分交由 AI 承担。学生课前通过 AI 自学基础概念,课堂时间聚焦于提问训练、信息评估、AI 协作和判断力培养,将有限精力投入到更有教育价值的地方。其次,提问能力本身需要分层训练,不是所有提问都有价值,低层次的提问是:这是什么意思?高层次的提问是:这个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有什么局限?如果换个角度会不会变化?课堂要帮助学生从事实性问题逐步进阶到分析性问题和判断性问题。第三, AI 成为对话伙伴而非替代者。学生与 AI 对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训练。学生需要学会如何把一个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提问,并在多轮对话中逐步逼近问题核心。最后,接受结论的开放性。当课堂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课堂内完成,学生带着未能解决的问题离开课堂也是学习的课后延续。

因此,实现这一价值重构需要教师放下一些旧的执念,讲不完所有知识是可以接受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超出预设范围是可以接受的,课堂没有得出统一标准答案也是可以接受的等。即教育的目的是唤醒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而非强制接受某种结论。

(三)角色重构:从知识权威到能力引导者

价值重构后,教师的角色也需要相应调整。教师需要从知识权威转变为问题引导者,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专业权威,而是权威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我讲正确答案,而是要训练学生提问、引导他们判断信息,教会他们与 AI 协作和在不确定性中做判断。

具体来说,教师需要扮演多个层面的新角色。首先教师是提问教练,他们不是代替学生提出问题,而是训练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这需要教师示范一个好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区分低质量提问和高质量提问,并在学生提问后给与有针对性的反馈。其次,教师是信息质量的把关人,当学生从 AI 获取信息后,需要引导他们进行批判性评估: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什么?逻辑上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在什么条件下这个结构不成立?第三,教师是 AI 协作的引导者,需要示范如何与 AI 进行多轮对话,如何把模糊的初始问题逐步细化为可查询的具体问题,整合 AI 提供的碎片化信息形成整体认识。最后,教师是判断力的培养者,在讨论和反思环节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追问促进学生审视自己的判断依据,让学生在表达和倾听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立场。这

一角色重构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外,也对学校提出了配套支持,否则只有教师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实现这一转变的。

(四)评价重构:从记忆考核到能力评估

从知识的存储到对话的转型,最终必须落在评价体系层面。如果评价体系仍然只考虑知识记忆,那无论课堂形式如何改变,学生和教师最终还是会回到应试的老路上,要实现转型,评价的焦点也要改变。

具体而言,评价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首先是提问能力的评价。提问不再是课堂互动的手段,而是被评估的能力。评价标准包括学生是否提出具有深度的问题而非仅仅是事实问题,能否在对话中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追问,能否将一个模糊的问题拆解成可探究的小问题,这一评价重点在于提问的质量与层次,而非答案是否正确。其次是信息评估能力,当学生借助 AI 获取信息后,教师可要求学生提供一份简要的信息评估报告,内容包括 AI 提供了哪些信息,你认为其中哪些是可靠的,你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验证,答案是否存在不足等,这种评价不追求标准答案,而是考察学生面对不确定信息时的判断过程与反思意识。第三,与 AI 协作过程的评价。传统评价只关注最终答案,而 AI 时代评价更关注学生与 AI 对话的过程,在对话过程中,引导学生注重过程的思考,从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到如何逐渐优化问题,到 AI 在哪些方面帮助你最终如何整合、修正提供的信息,这可以防止学生对 AI 的简单依赖,又将协作过程本身变成学习对象。需要强调的是,评价的重构并非取消知识性考核,而是在保留必要的考核同时提高能力评估在总评价中的权重。只有评价体系的改变,教师和学生才能真正在对话课堂中实现提升。

五、困难与应对思路

任何改革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与挑战,这一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师能力的挑战。多数教师缺乏提问训练等经验。甚至教师有时会不加批判地在课堂上使用没有实质性意义和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1],短期内难以适应新角色。日后可以从教研组集体备课开始,共享教学方案,试点一到两个单元,累计经验后逐步推广,学校层面则需提供针对性培训,重点训练教师如何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与 AI 对话。其次,学生的适应性问题。长期被存储式教育培养的学生会不习惯提问和对话,也不知道如何与 AI 协作。因此,初期可以设计匿名提交问题等低门槛方式,通过示范和辅助工具帮助学生建立信心。第三,制度存在压力。教学进度、技能考试、评价体系等现有制度会阻碍培养方式变革。因此,可以将能力培养与现有考核内容相结合,用阶段性的教学数据展示改革效果,拿出一部分课堂时间做深度探究,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最后,AI 的滥用风险。学生最常见的就是直接复制 AI 的回答而不进行自己的思考。因此,可设计 AI 使用透明化机制,要求学生明确说明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用 AI 思考是什么,它如何修改你的回答,将对 AI 输出的批判性评估本身作为学习任务。

六、结语

AI 时代暴露了存储式教育的根本困境,当知识随手可得,课堂若以传递知识为核心,学生的低头便是一种对无意义学习方式的抵抗,这正是弗莱雷所批判的沉默文化在当代高职课堂的体现。因此,课堂改革的方向应该从存储到对话,这需要从价值上、角色上、评价上的三重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从被动的容器唤醒为主动认知的主体,培养适应 AI 时代会提问、会判断、会协作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 [1]FREIRE P.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 Ramos M B,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1970: 72-85.
- [2]黄志成,王红菊. 弗莱雷的"对话式教学"述评[J]. 全球教育展望,2001(6): 57-60.
- [3]蒋瑾,姜浩哲,黄志成.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育的隐忧与消解——来自弗莱雷对话教育思想的启示[J]. 教师教育研究, 2022,34(5): 124-128,97.